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5.012

“自由时间财富尺度”的劳动逻辑回归基点

——马克思“实际从属”阶段“机器体系”的价值解读

陆自荣,张虹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是资本逻辑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此时,劳动是以机器体系使用为标识的社会劳动,受制资本逻辑,机器体系全面取代工人是“实际从属”特殊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机器体系的社会劳动的价值形式,马克思给予了科学考察,提出了不同于“劳动时间财富尺度”的“自由时间财富尺度”。“自由时间财富尺度”体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是对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总结和界定。同时,“自由时间财富尺度”也为新的生产力水平下生产关系的新形态提供了支点,此时,马克思劳动理论完成了资本逻辑批判走向劳动逻辑构建。该逻辑建构在非生产劳动统领的共同性生产中得到初步呈现。

关键词:劳动逻辑;机器体系;自由时间财富尺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5-0095-09

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全面批判。该批判中,“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是资本逻辑和劳动逻辑转换的核心环节。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逻辑的推进,资本和劳动关系也在不断演变,劳动对资本的从属经历了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过程。“实际从属”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通过技术创新(机器体系使用)带来“超额技术垄断利润”是“实际从属”的特殊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机制。由于代表科学技术发展的“机器体系的固定资本”在进入劳动之前就吸收了大量自由时间,因此,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时间的财富尺度将被自由时间所替代。“自由时间财富尺度”是马克思考察机器体系(智能机器体系)后提出的重要观点,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显现该论断的科学性和前瞻

性。同时,学术界对其关注也越来越多,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个方向:一是生态学的解读。生态马克思主义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财富尺度”是超越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财富尺度,“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生产方式中的财富、时间、需要之间关系的认识 and 构想”^①,此时的需求等级和丰裕观念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财富观不同,其中蕴含极其丰富的生态学思想。二是政治经济学解读。如:说明“自由时间财富尺度”对发展消费与休闲经济的积极意义^②;从财富及其财富生产的角度来理解“自由时间财富尺度”,把其看作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统一的尺度^③;“自由时间财富尺度”标识劳动价值的历史性,“劳动决定价值”只是异化劳动的结果^④;等等。三是哲学社会学解读。“自由时间财富尺度”和“社会必要劳动时

收稿日期:2023-04-26

作者简介:陆自荣(1966—),男,湖南邵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社会学研究。

①彭学农:《伯克特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维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②郑必清:《论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与财富的思想》,《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③卫兴华:《马克思的财富论及其当代意义》,《经济问题》2019年第2期。

④赵磊:《“劳动决定价值”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学术月刊》2019年第12期。

间尺度”归结为两种尺度,即人的发展尺度和劳动尺度^①。由于“自由时间财富尺度”是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财富尺度”的取代,因此,其自然关联劳动价值论。上述三种解读中,不少研究把其看作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式微的依据。如:“伯克特认为,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作为财富衡量标准的递增的不合格性。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看到了在社会化大生产、工业化、科学的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劳动价值论的式微及其失去历史地位的趋势。”^②再如:赵磊在讨论共产主义的“劳动份额”如何计算时,指出:“如果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那么价值概念将趋于消亡,劳动价值论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劳动份额的计量也就失去了意义。”^③虽然“自由时间财富尺度”是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财富尺度”的取代,但并不能就此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反,“自由时间财富尺度”是马克思劳动逻辑回归基点,表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迈入人类社会的高阶形态,是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的集中体现^④。

一 机器体系全面替代工人:“实际从属”的必然结果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管是“形式从属”还是“实际从属”,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对立。对此,马克思指出:“即使考察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较不发达阶段和较为发达阶段所共有的一般形式,生产资料,劳动的物的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也不是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工人。”^⑤资本使用劳动,工人对资本来说只是手段,资本依靠工人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且增加自己的价值。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也是活劳动与对象性劳动的对立,在“形式从属”阶段表现为工人和一般生产资料的对立,此时,虽然是对立,但工人劳动的整体性,工人劳动时间创造价值的性质还没有完全被遮掩,工人在生产中的重要性还比较直观。

但是,“实际从属”阶段则不同,此时,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表现为工人与机器体系的对立,机器体系取代工人,工人在劳动中丧失了整体性和自主性。并且,工人地位的丧失和机器体系的重要性沿着相同的方向,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越演越烈;而这种演进的动力来自“实际从属”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首先,“实际从属”的特殊资本主义的“高额技术垄断利润”之发展动力机制成为机器体系替代工人的内在动力机制。“实际从属”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同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其是靠获取“高额技术垄断利润”来推动。资本家使用机器体系、进行技术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其生产效率,使自己产品的生产价值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其可以在市场上以不低于其产品的劳动时间而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自己的产品。这样既能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扩大市场又能为自己带来“高额技术垄断利润”,否则,其必定在市场中被淘汰。因此,在“实际从属”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获取“高额技术垄断利润”既为特殊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动力,也是机器体系不断取代工人的内在机制。

其次,“实际从属”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最低限度”与“高额技术垄断利润”一起共同推进机器体系取代工人。“资本最低限度”和“高额技术垄断利润”互为条件。一方面,“资本最低限度”是采用机器体系的条件,也是获取“高额技术垄断利润”的条件。机器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资料固定资本相对于直接生产的生产资料固定资本,其要求的数量要多得多,资本要想采用机器体系从事社会化大生产必须具有“资本最低限度”。另一方面,“高额技术垄断利润”也为维持和扩大机器体系提供资本积累。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全社会或全行业都采用新技术(新机器体系)只能带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此时所有资本家或全行业的资本家都能获得平均利润。对于单个资本家而言,如果他的利润

①丰子义:《关于财富的尺度问题》,《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②彭学农:《伯克特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维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③赵磊:《澄清质疑共产主义的三个理论困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④陆自荣:《马克思的劳动公共性的批判性建构——兼析阿伦特劳动私人领域批判》,《求是学刊》2020年第2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9页。

只是平均数,如果他和其他资本家相比没有获取更高的利润,也就根本无法保证其采用比其他资本家先进的机器体系以及扩大生产规模的资本积累要求。因此,只有“高额技术垄断利润”才能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采用新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提供资本积累。

最后,“实际从属”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席卷各个部门”也根源于“高额技术垄断利润”的动力机制。一个企业能够采用先进机器体系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其就能够获得“高额技术垄断利润”,能够比其他企业更迅速地积累资本,进而扩大生产规模和采用更先进的机器体系。此时,先进的机器体系采用和资本迅速积累以及企业规模扩大相互迭代,形成循环。同时,随着循环的推进和资本不断积累,新积累的资本一旦在本行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寻找新的行业扩展。这些积累的资本也将为其在其他行业开展机器体系生产提供“最低限度”的资本。积累的资本一旦进入其他部门,必定在新的部门复制同样的生产模式,最后,全社会的各个行业都将演变为机器体系取代工人的社会化大工业生产模式。

正是由于机器体系可以全面替代工人,为“实际从属”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带来大量剩余价值,因此,从资本的角度来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适当的形式”。在此,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大工业、机器体系和资本主义的一致性:“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①在此,马克思认为,机器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物的形态)的最后形态。同时,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机器这种生产力的物的形态在整个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这种物的形态和活劳动(工人)相对立,整个生产不是表现为工人的劳动能力,而是表现为机器的劳动能力,此时,也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适当的形式。对此,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抛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②

二 社会劳动的自由时间:机器体系价值源泉的实质

从资本使用机器的目的来说,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剩余劳动。对此,马克思指出:“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作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采用机器。”^③在此,马克思说明,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动机就是为了占有工人的“当做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时间。什么才是“当做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时间?从工作或劳动角度来看,时间无非是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两种,因此,马克思在此要说明的是资本家在可以占有工人的自由时间的时候才使用机器。那么,在机器体系的劳动中,资本家或者说资本如何占有工人的自由时间^④。机器体系下大工业劳动是社会化劳动,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协作的劳动,社会化劳动和直接劳动在价值实现和表现形式上具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异最明显的是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量和质)与直接劳动的不同表现。对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马克思的一段论述:

“活劳动同物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决定因素。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2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④陶焘:《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生态意蕴》,《湖湘论坛》2021年第6期。

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①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1)活劳动同对象性劳动(物化劳动)交换,这是直接劳动的价值关系体现,也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对立的形式,这种劳动是通过劳动时间或已耗费的劳动量来体现财富创造;社会劳动是这一价值关系的最后阶段,或者说社会劳动将终结这种价值形式。(2)社会劳动的价值实现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或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凝结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机器体系(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3)机器体系固定资本的价值(作为对象化劳动将在生产中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也不是完全由直接劳动时间来决定(和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与科学技术水平相关。

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一再强调剩余价值是由劳动时间所创造,劳动资料不创造剩余价值,只是作为对象化劳动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之中。机器体系的社会劳动自然也要遵守剩余价值理论。但是,机器体系的社会劳动中剩余价值实现更具有隐蔽性,无论是机器体系固定资本的价值还是利用机器体系的社会劳动生产所创造的价值都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中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而是和科学技术水平相关。在此,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理论强调劳动时间,另一方面是机器体系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不表现为直接劳动时间而和科学技术水平相关;那么,解决二者矛盾的关键是“机器体系的技术水平”是否关联某种不同于直接劳动的劳动时间。

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社会化生产中,不能再套用直接生产中以劳动时间衡量价值和剩余价值(财富)的尺度。不是劳动时间,那应该是什么?马克思首先将其界定为“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或者称之为“社会个人的发展”。对此,马克思写道:“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

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②“一般生产力”即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因此,“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占有”或“社会化个人的发展”其核心都指向“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马克思认为,在机器体系的社会劳动中以及未来社会劳动中,“科学技术运用”标准和劳动时间标准相比,劳动时间标准“显得太可怜了”。

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社会劳动中,劳动时间标准难以承担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尺度,此时,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尺度和“科学技术的运用”相关。“科学技术的运用”使“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不像“直接劳动”由劳动时间创造那样凸显,但是价值还是由劳动创造,是劳动中的科学技术含量创造了价值。社会劳动中的科学技术含量创造了价值,而“科学技术运用”也就是“个人的一般生产力”或者“社会化个人的发展”。那么,“个人的一般生产力”或者“社会化个人的发展”靠什么来保证。马克思认为,“个人的一般生产力”“社会化个人的发展”或者“个人的科学技术学习、创新、掌握、运用”都需要个人的自由时间。因此,在“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自由时间将替代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尺度。对此,马克思写道:“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③

机器体系生产离不开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大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共同劳动的结果,并且这种共同劳动绝大多数体现为自由时间的自由劳动。因此,机器体系本身就凝结了大量的自由时间的自由劳动。资本家(资本)正是相中了机器体系中凝结的自由劳动,所以采用机器体系进行生产,以便占有机器体系中的大量自由时间的自由劳动,为其带来大量的剩余价值。在此,马克思批判了罗德戴尔的固定资本可以离开劳动独立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荒谬理论”,并指出这种“肤浅诡辩貌似有理”的实质是没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看清机器体系固定资本的价值源泉的实质。“罗德戴尔之流认为资本本身离开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因而也可以创造剩余价值(或利润),对这种观点来说,固定资本,特别是以机器体系为其物质存在或使用价值的资本,是最能使他们的肤浅诡辩貌似有理的形式。”^①

固定资本是对象性劳动,“机器体系的固定资本”也是对象性劳动,固定资本创造价值的源泉“只有从它本身是物化劳动时间来说,并且从它创造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才是这样的源泉”^②。但是,这还只是一般的固定资本的价值转移的形式,即把固定资本中的对象性劳动,或者劳动时间的价值,进行转移。在机器体系的固定资本中,转移的还有自由时间的自由劳动,而这种自由时间的自由劳动,在机器体系的固定资本生产中被掩盖,而在其使用时被资本家占有。这也是资本家为什么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更新机器体系的原因,因为技术创新更多是和自由时间的自由劳动关联,而这种劳动往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遮掩,其本身凝结的自由时间被遮掩,其自由时间的巨大财富被遮掩;而且这种遮掩是全社会性质的,涉及所有的科学技术进步的所有环节。鉴于“机器体系的固定资本”的这种特殊性,即“机器体系的固定资本”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工具表现,马克思称“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③

三 自由时间财富观:回归劳动逻辑的基点

建立在“机器体系的固定资本”的社会劳动的价值主要通过机器体系所吸收的自由时间来衡量;同时,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要坚持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为资本

主义的剩余价值永远要通过剩余劳动时间来体现,离开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就无法实现。这样,“实际从属”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矛盾也就表现为“时间矛盾”,即“机器体系的社会劳动以自由时间作为财富尺度和资本逻辑的剩余价值生产坚持劳动时间的财富尺度”的矛盾。因此,从剩余价值生产的出发要求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尽量多,从“实际从属”的特殊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生产来说要求自由时间尽可能多。但自由时间(非劳动时间和不作为交换价值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时间(作为交换价值的劳动时间)总和是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的追求必定会牺牲自由时间。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永远存在;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机器体系的发展,二者矛盾会更加凸显,因为到时需要更多的自由时间而相对缩减剩余劳动时间(从资本的贪婪本性来说希望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时间)。对于“实际从属”的特殊资本主义的时间矛盾,马克思写道:“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④这些矛盾马克思也将其称之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这也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和“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表达的实质。

“实际从属”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的“时间矛盾”必定会造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带来资本逻辑的终结。对此,马克思在很多论述中都给予了明确的说明。如:马克思指出,当直接劳动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时,“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⑤;一旦劳动时间不再成为财富的尺度,交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那么,“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①。

马克思在阐述机器体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时,一方面肯定机器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适当的形式;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最适合机器运用”则给予否定性批判。如果说大工业和机器的应用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适应的形式,这仅仅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力本身考虑问题。追求“高额技术垄断利润”的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机制,同时,资本主义也只有不断通过发展生产力,才具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不断技术创新,才能不断积累资本,才能让资本不断席卷其他领域,扩展自己的地盘和加固自己的支配地位)。但是,马克思与斯密、李嘉图、穆勒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不仅仅从生产力角度考虑问题,更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角度来考虑问题。此时,马克思也表现出和斯密、李嘉图、穆勒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对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从生产力角度分析,采取的是非批判性的研究,其研究中预设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适合机器的应用,最适合技术创新,这种预设是为了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终极性。但是,马克思既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视角来分析问题。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来看待技术创新就能发现,资本主义的“物化关系”绝对不是技术创新的最好社会生产形式。技术创新应该既要照顾物质生产,也要顾及人与人的关系,从最终意义上来说,技术创新是人的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来自人的兴趣、人的自由、人的好奇心等等。对物的兴趣只是人的兴趣的一种,绝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此,马克思指出:“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当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

情况,是采用机器体系的最适当和最完善的社会生产关系。”^②相反,这些新的物质生产力将“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出现条件”^③。

马克思的“实际从属”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根本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看到“生产在资本关系中是怎样进行的,但是他们看不到这种关系本身是怎样被生产的,同时看不到在这种关系中又怎样同时创造出瓦解这种关系的物质条件,从而看不到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生产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是怎样消除的”^④。相反,马克思的“实际从属”理论“不仅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的,以及跟资本进入生产过程时相比资本又是怎样作为根本改变了的东西走出生产过程的”^⑤。这种深刻的不同,一方面看到了“资本改造了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生产方式的这种改变了的形态和物质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又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即前提”^⑥。同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揭示,从中发现其否定性因素,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取代的根源。这种瓦解的历史道路也将“实际从属”开始向前延伸。对此,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⑦。“实际从属”的社会劳动阶段,“个别人占有生产条件不仅表现为一种不必要的事情,而且表现为和这种大规模生产不相容的事情”^⑧。大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和社会所有是对立的。“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页。

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①

社会的个人所有也是由自由时间财富观所赋予的最适合的形式。其一,自由时间财富生产主体的弥散性决定社会的个人所有是其必然选择。自由时间财富是凝结在机器体系中的人或者说人类的自由时间,这种时间难以量化,也难以确定由谁提供,这种时间下的财富创造原则上讲是一种共同创造,是历史的创造,虽然在整个创造过程中,某些人物居于关键地位,某些时刻是关键时刻,但在整个创造过程中,并不能完全以关键人物和关键时刻来确定价值贡献的大小。总之,自由时间财富创造是合作的创造、历史的创造,并且其弥漫于整个社会文化中,无法精确界定其归属。其二,自由时间财富生产主体的自我实现需要决定社会的个人所有具有可行性。自由时间财富是自由劳动的财富,劳动关联着需要,不同劳动关联不同需要;自由时间的自由劳动需要和一般雇佣劳动的需要肯定不同。后者更多倾向于物质利益,前者更多倾向于自我实现。为社会做更多贡献,这是自我实现的、自我价值的最高境界。因此,马克思把自由劳动看作异化劳动的对立面,自由劳动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而异化劳动最多能带来个别人的物质利益的满足。解放的取向、人类社会的取向,而非市民社会的私利的财富取向,表明自由时间财富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具有切实可行性。至此,劳动逻辑也必将随着社会的个人所有制的建立而不断推进。

四 自由时间下的劳动逻辑:非生产劳动统领的共同性生产

(一) 共同性生产的劳动逻辑

劳动逻辑区别于资本逻辑是全方位的,如人的需求体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态等等。其中,生产关系形态又具有标识性意义。正是通过剩余价值生产,马克思揭示了资本逻辑,此时,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逻辑的标识。与剩余价值生产不同,共同性生产是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逻辑生产关系的标识。马克思指出:

“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产品成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最初在生产中发生的交换,——这不是交换价值的交换,而是由共同需要,共同目的所决定的活动的交换,——一开始就包含着单个人分享共同的产品界。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劳动,而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应成为一般劳动;也就是说,产品的交换决不应是促使单个人参与一般生产的媒介。”^②在此,“生产的共同性”或者“共同性生产”(有时表述为“共同生产”)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而通过交换“成为一般劳动”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共同性生产是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劳动逻辑区别于资本逻辑的标识。

共同性生产是劳动逻辑的标识,也可以从自由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区分中得到验证。如果资本逻辑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那么劳动逻辑下的劳动就是自由劳动。作为劳动逻辑标识的共同性生产关联自由劳动的需求体系及其实现方式。

什么是自由劳动?自由劳动是社会个人本质力量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劳动,是自我实现的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是和人的兴趣、创造性相关联的劳动。马克思对此的描述是:“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③从马克思的这段描述中,可以感受到,自由劳动需求体系除了与人的生产与生活需要的物质需求外,天性、兴趣、创造性、本质力量发展的精神愉悦需求更凸显。物质需求和精神愉悦的结合,也是自由劳动与拜物教的异化劳动需求体系的根本区别^④。这一区别也回应了自由劳动的共同性生产标识。

自由劳动与共同性的关系也根源于其精神愉悦与物质需求的有机结合。首先,不同于物质利益,精神观念是“共同性”取向的。物质利益总体是分,某个人分得多,其他人自然就分得少;精神观念不同,分享的人越多则观念显得越强大。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页。

^④杨煌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辩证法内蕴——以“异化劳动”为中心》,《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2年第1期。

此,精神愉悦本身具有“共同性”。与精神愉悦相统一的物质需求也不同于私有制下的资产阶级拜物教的物质需求,后者是极端的物欲主义,前者只是满足个人本质力量发展的物质需求,此时的物质生产一开始就具有共同性,马克思表述为“一开始就包含着单个人分享共同的产品界”或“劳动在交换以前就应成为一般劳动”^①。

(二) 自由时间下非生产劳动统领共同性生产

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生产是任何社会都具有的两种生产形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财富生产是交换劳动,财富是货币、资本等物质财富;此时,精神文化生产往往也受制于交换劳动,用交换劳动(货币)来度量其价值。自由时间的财富生产则不同,其劳动是自由劳动。即使物质生产劳动也是关联社会个人的兴趣、是社会个人本质力量发展的需要,绝不是奴役性的、强迫性的。同时,自由时间下的劳动生产更多地体现为知识、技术、信息、情感、兴趣、爱好、精神文化等社会个人的本质力量的生产。此时,无论是物质生产劳动还是精神文化的非物质生产劳动,其价值都不是用交换劳动来衡量,劳动一开始就是共同性生产。其中,非生产劳动的共同性根源于其精神文化产品的共享性;同时,由于自由时间下的非生产劳动的发达,导致非生产劳动将主导生产劳动并赋予生产劳动共同性。

关于自由时间的财富生产的物质生产劳动和非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但马克思在批判斯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中呈现了相关思想。

马克思反对斯密用“物质内容来确定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这样的“企图”有三个来源^②: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拜物教观念:这种观念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如商品、生产劳动等,看成是这些形式规定性或范畴的物质承担者本身所固有的属性。

(2)就劳动过程本身来看,只有以产品(即物

质产品,因为这里只涉及物质财富)为结果的劳动是生产的。

(3)在实际的再生产过程中,——如果考察它的现实要素,——就财富的形成等等来说,表现在再生产性物品中的劳动与仅仅表现在奢侈品中的劳动之间有很大差别。

马克思认为,斯密所否定的非生产劳动更多是和人的天性(本质力量)相关,而斯密所肯定的生产劳动只因为其生产了剩余价值。

“密尔顿创作《失乐园》,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者,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生产《失乐园》,象蚕生产丝一样,是他天性的表现。……象鸟一样唱歌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假如她为了货币而出售自己的歌唱,她就因此而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商品交易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直接生产资本。”^③

在此,非生产劳动有几点值得注意:(1)非生产劳动是批判斯密的不带来价值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非生产劳动只是不带来剩余价值,并不能否定其价值创造。(2)非生产劳动更多地和人的天性相关联,人的天性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因此,非生产劳动相比生产劳动更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3)非生产劳动更能体现社会个人本质力量,从这一点来看,非生产劳动蕴含了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劳动的向度。

在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与生产劳动的启示下,哈特和奈格里区分了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当然,物质劳动不等同于生产劳动,非物质劳动也不等同于非生产劳动;但生产劳动与拜物教的剩余价值生产关联,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财富尺度主导下的剩余价值生产,此时,财富是物质财富;相反,非生产劳动则是与人的天性相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其本身往往并非物质财富生产,如:创作和歌唱本身并不生产物质财富,只有当创作和歌唱的作品出售换得货币或在雇佣劳动下成为资本增值的活动时才是物质财富生产形态。从这一点来看,物质劳动与生产劳动、非物质劳动与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06页。

非生产劳动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区分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之后,哈特和奈格里进一步用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来说明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性生产。

“每当共同性遭到破坏,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力就会降低。例如,科学知识的生产是一个非常专门化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与生命政治生产有很多共同特征。若要生产新的科学知识,过去科学行为所生产出的相关信息、方法和观念就必须对广大的科学共同体开放,同时,在不同的实验室和研究者之间,应该通过期刊、会议等中介,建立高度发达的合作与流通机制。当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它必须成为共同的财富,将来的科学生产可以将其作为起点。生命政治生产必须以这种方式确立一种良性循环,从已有的共同性走向新的共同性,从而成为扩大生产的基础。”^①

非生产劳动的共同性根源于劳动成果的共享性,如科学、技术、知识、信息、文化产品等都具有共享性。那么,物质财富直接关联的生产劳动的

共同性如何保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非生产劳动的发达,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劳动将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此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凝结的智能机器体系(人工智能)将主导物质财富生产,智能机器体系在生产劳动中的广泛运用,人类将从物质生产领域得到根本性解放,使物质财富生产也将由人的本质力量所主导,也将实现自由劳动的生产^②。

物质财富生产由智能机器体系主导,非生产劳动(自由劳动)的共同性生产特征也将延续到生产劳动(物质劳动、物质生产)领域。生产劳动(物质生产)领域不再是以消耗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社会必要劳动为准则,绝大多数物质劳动将由人工智能所取代,人们直接从事物质生产领域生产也将成为个人的兴趣、自我实现的需要,不再是强制和奴役,而是自由选择,自由劳动从根本上取代异化劳动。作为社会个人自我实现的物质生产劳动也将从一开始就具有共同性。

On the Growing Point of Labor Logic in “Free Time Wealth Measurement”:

The Value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Machinery System” in “Actual Subordination”

LU Zirong & ZHANG H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actual subordination of labor to capital” is an importantly historical stage of capital logics, wherein the labor refers to the social labor which is the utilization of machinery system. Subjected by capital logics, the overwhelming replacement of the workers by the machinery system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actual subordination” of the special capitalism. Marx has conducted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n the value form of social labor of the machinery system, and proposed the “free time wealth measuremen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bor time wealth measurement”. The “free time wealth measurement” reflects the continuity and innovativeness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labor value, acting as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in the new era. Besides, “free time wealth measurement” also provides a pivot point for the new formation of productive relations at a new productivity level,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Marxist labor theory has transformed from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 logic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 logic. Hence, “free time wealth measurement” also becomes the base poi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 logic, which is preliminarily presented in the co-production led by non-productive labor.

Key words: labor logic; machinery system; free time wealth measurement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衍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②孔明安,谭勇:《新自由主义的迷思及其三重哲学批判》,《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